

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與與韓中關係

朴斗福

(韓國外務部外交安保研究院教授)

序 言

最近中共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比過去更具彈性，顯出有現實主義的傾向。假使說過去數年間，中共對北韓僅有說服力的名分，則可以從中共與韓國積極交流的事實，或者中國爲了與韓國經濟交流的積極姿態中得知。

中共對朝鮮半島的政策與態度有如此的變化，這可以看做是在毛澤東死後，中共所發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以及對外政策等全面性變化直接投影在與朝鮮半島關係的結果。因此，在往後展望韓國與中共關係發展，進而摸索韓國對中共的政策方向上，是迫切需要對最近中共對韓政策變化的根本作深入分析的。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積極推進改革政策，保守理念傾向的元老勢力大幅退却，由合理主義的改革勢力大肆進行改組權力結構。因而在決策上，意識形態的作用較弱化的「超脫意識形態化」現象更形顯明。中國社會的這種「超脫意識形態化」的現象與決策過程的變化，是可以寄望中國外交政策上有融通性與多樣性的，同時亦可大力擴大外交活動的領域。而且，中共外交政策的新取向成爲中共調整其對朝鮮半島的認識與政策的重要原因。

本文主要著重在分析毛死後，改革實用主義勢力登場以及由他們這些改革勢力所積極推進的實用主義現代化政策路線開展如何投影在韓中共關係發展上，尤其分析在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上，所出現的中共外交政策新取向與他們所調整的對朝鮮半島政策又有什麼關聯等的問題。

一、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其基礎與展望

1. 中共對朝鮮半島的認識與利益概念的變化

中共積極推進改革政策的結果，正使得中共社會的價值觀產生重大的變化，亦即，過去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強調階級鬥爭論和革命理念褪了色，塑造出經濟價值重於一切的價值觀。

首先，中共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全大會」上，提出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做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並且指出中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在與漸次增漲的人民物質慾望成相對性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同時又強調應著重在發展如此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上¹。這正意味修正以往所倡階級矛盾為主要矛盾，以及根本上從設定階級鬥爭為國家基本目標的毛澤東觀點裡，擺脫出來。於是，隨著過去強調階級鬥爭論而塑造的革命與理念價值漸將褪色，出現經濟價值為最優先的價值。

中共政府使改革焦點看重在鼓吹生產與經濟的積極性、以及增大經濟面的效率性，也由此可知是經濟價值優於一切的。也就是說積極擺脫過去所鼓吹的經濟與生產活動之積極性徹底失敗的史達林統制體制，並且積極引進所有概念的變革、市場原理或競爭、物質誘因（Incentive）概念等資本主義的經濟方式；尤其是為了經濟發展或經濟改革的更進一步進展而完成政治本身的改革，由此可知經濟發展成了中共所有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中共如此的改革政策與價值觀的變化導致決策過程的重大變化。亦即，大力去除過去中國決策過程所強調的革命與理念的要因，同時塑造經濟要因或合理性、科學性等。於是形成中共對認識外部世界的基本尺度也由革命、理念和階級鬥爭論變換為國家利益或經濟價值。現今中共全面擺脫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戰爭不可避免論²，而且對蘇觀點也正產生根本性變化，這正是反映中共隨著社會價值觀的重大變化所產生的對外部世界認識的變化。

然而，中共這樣的價值觀變化或對外部世界認識的變化，使得中共對朝鮮半島的認識或利益概念等也隨之變化，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可以看出過去中共對韓國的認識與利益概念，主要以革命、理念和戰略價值做為基本尺度來構成的。因此，過去中共對朝鮮半島的認識裡祇有北韓的存在；而他們的對朝鮮半島政策也僅有對北韓的政策。就是說當時中共的對朝鮮半島政策是在對北韓政策的延長線上達成的，所以中共的對朝鮮半

1：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共「十三全大會」上的報告），「大公報」（香港），1987年10月26日參照。

2：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紅旗」，（北京），1982年第18期，P.P 21-24。宦鄉，「堅持獨立自己的對外政策」，「人民日報」，1982年10月31日。

島政策與對北韓政策都帶有祇能完全一致的高度一元化傾向。

不過，由於中共價值觀的變化或對外在世界認識的變化，這些不可避免地使中共對朝鮮半島的認識有變化。最近韓國雖是被中共限制的範圍，但他們卻認定韓國為其對話與交流的「客體」，由此可知中共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正發生重大的變化³。可是中共的對朝鮮半島政策正同他們的改革政策進展一起更具體化。這在中共使亞太地區的高度經濟發展與他們的現代化兩者連貫方面，對韓國評價為經濟、地理上皆居重要的中央部位；⁴ 中共更肯定、積極地評價上次韓國總統選舉的結果⁵。

特別是朝鮮半島周遭強國間敵我觀念的起伏顛倒，也對中共對韓產生重大影響觀念。

一九五〇年末到整個一九七〇年代的期間，出現了中蘇對立的。中共極端的反蘇路線下的產物—反蘇、以及對美一邊倒政策，使韓國對中共形成了戰略性協力國、即友好國家的友邦關係。因此，可以看出經由美國與中共兩國間戰略性協力或發展關係等的媒介過程，在潛在的狀態下，中共對韓國的敵對意識或態度進行實質的改善。而且，從由歷史或地緣政治學上，來看中共與蘇聯經過支配與獨立、變更領土維持現狀與恢復過程的歷史，也由於中共遠交近攻的地緣政治學概念來看時，中共對蘇聯具有根深蒂固的歷史仇恨關係；反觀對美國，除了傳統性韓戰期間之類的特殊狀況外，卻具有友誼的感情⁶。事實上，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以後，中共展開全國性抗美援朝運動的最終目的，也是中共斷絕與西方一切關係的主要方法；同時主要目的在將中國人對美蘇傳統的友敵觀念反覆使與當時中共對蘇一邊倒的統治原則一致⁷。

但是不可否認的，中國人對美國的這種傳統性友誼感情影響加深了中國人對南韓的緩和態度。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雖然與南韓的關係仍未達到官方的水準，但是對南韓是友好的，並且對發展相互關係有著強烈的要求。

3：朴斗福，「韓中共關係發展的主因與韓國對中共政策的方向」，「國際情勢與韓國外交」（1986年度外交安保研究院；IFANS年例報告），P.136。

4：黃大明等七人，「亞、太經濟態勢與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社會科學」（上海），1975年第8期，P.16。

5：曹遠征，「巴西、南朝鮮政治經濟體制的分析」，「世界經濟報導」（上海），1987年10月12日。又「有關我國大總統選舉結果的四強與北韓的反應分析」，「主要國際問題分析」（IFANS），1987年第102號參照。

6：朴斗福，「中蘇紛爭的激化與亞細亞、朝鮮半島」，「政經研究」（Seoul），1975年12月號，P.P45-48參照。

7：朴斗福，「中共參加韓戰原因之研究」，（臺北黎明出版社，1986年）P.P22-236參照。

又中共在朝鮮半島，其價值觀的變化與對朝鮮半島認識的變化，給自己帶來利益概念上的重大變化。就是說中共產生的超意識形態化現象，導致他們與北韓友好關係方式所追求的革命與理念價值褪色，而經濟價值被塑造成為兩國最重要的價值；並且在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上，經濟的因素以一新調整的變數出現。

當外交政策看做是達成國家目標的一種手段時，外交政策必須適應這樣的國家目標。因此，中共發展社會生產力，就是在經濟發展上設定國家目標，所以在他們的外交政策方面，經濟要因都比任何一樣占有重要地位，對外政策本身也因而成經濟化⁸。中共對外政策的如此「經濟化」趨勢投影到調整他們對朝鮮半島的過程上，朝鮮半島便是他們經濟價值的塑造，然而，中共這樣的朝鮮半島經濟價值，祇好追求與南韓的關係更高過與北韓的關係。如此一來，中共與北韓的關係下所追求的革命與理念性價值將喪失其重要性；相反的，與南韓的新關係所產生的經濟價值，在往後中共對朝鮮半島利益概念上反而會占有更重要席位。

又中共目前與北韓關係上所追求的最重要價值—戰略性價值，也隨中蘇關係急速的發展而漸漸減少其重要性。尤其，北韓對中共的戰略重要性為中蘇對立的前提，所以最近中蘇關係急速發展會使這樣的前提動搖的。因此，中蘇關係一改善，則愈會使北韓對中共的戰略性價值也更加消褪的。

以上中共對朝鮮半島的認識與利益概念的變化，為使中共無法避免調整其對朝鮮半島現有政策的要因，並且以此發揮作用。同時在中共長期性對朝鮮半島二分化的過程上，會產生「北韓因素」弱化的重要性發展。

2. 中共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與對朝鮮半島政策的「二分化」

一九八二年以後的中共更具獨立自主性，並且有彈性地展開其積極的對外政策。然而，我們可知中共在這種外交政策的背景，已經對他們自己現有的世界戰略觀點有了重要的變化。同時，也可知「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正是被提出來做為符合中共對外認識與對外關係等變化的新對外政策基本原則的。

中共這種新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特徵可從擺脫集團分類的戰略概念（陣營論）而轉換成自主的戰略概念方面找到。於是，中共強調他們不依靠某一大國而成為某一集團的成員，同時也不根據這些來設定敵友關係，以及也不與某國締訂有形、無形的聯盟⁹。從任何角度來看，總被認為中共「十二全大會」以後所強調的「獨立自主」意味，就是拋棄單純由集團（陣營）分類世界的現有觀點。還有，雖然過去中共強調和平共存五原則

8：劉毅，「轉變中的中國外交」，「知識分子」（N.Y.），1985年7月季號），P.49。

9：胡耀邦，同註2參照。

，但由於他們的基本戰略思想根據「針對特定敵對國的反對」¹⁰，所以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僅限於「反對共同的敵人」的前提下才可以有所發展。於是，過去和平共存原則的適用範圍也祇好有所限制了。

然而，可以觀察出來根據「敵對國的反對」的戰略思想是出自毛澤東的世界大戰不可避論。但正如前言，中共現今已全面擺脫世界大戰不可避論，而且以此做為過去中共世界戰略思想根基的「敵對國的反對」早已喪失其重要的意義。

又過去中共的外交基於長期的陣營論與對敵思想下，帶有「一元化」的傾向。由擺脫這種「一元化」而去追求「多元化」方面，正可以找出中共新外交政策的另一特徵¹¹。

另外，前面已經提過的「超意識形態化」與「經濟化」也可以被指為是中共新外交政策的重要本質。

正如以上所述，中共的新外交政策揚棄向某特定國家一邊倒或特別親近的政策，追求也與現有敵對國改善關係，而且其基本目標放在以此來維持均衡，並減低國際社會對本國的「敵對面」，同時增強「友好面」。

於是，中共無法避免積極擺脫過去外交政策的僵化性作風，追求更帶有現實主義取向的政策，並且大力調整與蘇聯或朝鮮半島等國過去根據毛思想因而受到重大影響的關係。

但是在過去中共與北韓的關係根據革命與理念、陣營論而決定的時期，中共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具有與對北韓基本關係的本質變化中找得到。亦即，過去形成中共北韓血盟關係的基本出發點的革命與理念，其一致性已弱化了，而過去隨著強調這種革命與理念的關係明顯塑造的國家利益與相互主義原則相對地受到重視。因此，在實質性的利害關係與現實性問題焦點等方面，雙方的對立差異逐漸成為表面化。

因此，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以維持現有友好關係為基礎；同時隨著朝鮮半島狀況的具體性變化，將逐漸根據其本國的基本利害關係調整對朝鮮半島的關係。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因而出現「二分化過程」。

猶如從最近中共要求展開南北韓對話以及不滿北韓中斷對話等可以看出一樣，中共與北韓對於緩和朝鮮半島緊張與落實和平的不同立場已表面化，而且中共對韓國經濟發展或北韓對外開放問題的看法和北韓不一致。

10：一九五〇年代反美統一戰線，文革期間的打倒帝國主義反動派，一九六〇年代反蘇統一戰線等全部都意味著「敵對國的反對」影響了中共外交基本指導思想。

11：朴斗福，同註3「韓中共關係發展的主因與韓國對中共政策的方向」，P.P 134-135 參照。

總言之，中共、北韓兩者對緩和緊張等朝鮮半島問題的根本立場與利害關係上出現齟齬（gap），導致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二分化的結果。至於中共這種朝鮮半島政策的二分化趨勢，在中共改善對南韓關係的環境上成爲最重要的因素。

3. 中蘇關係發展下的中共對韓政策

今年五月十五日起一連四天的中蘇高峰會議，象徵兩國關係終止了過去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持續不斷的敵對關係，邁向完全正常化進展的。亦即，此次高峰會議兩國相互協議，一致要使國與國的關係完全正常化，當然黨與黨的關係也不例外。兩國關係於是可達成政治、經濟、社會等全面領域的發展與交流的。

如前所述，中蘇關係的發展使北韓對中蘇兩國的戰略性價值弱化，以此緩和中蘇間對北韓的競爭。過去中蘇對峙惡化，蘇聯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性威脅時，北韓在中共防衛上占有絕對性的重要席位；反觀蘇聯，主要在對中共包圍的攻擊性層面占有重要的戰略性位置，所以隨著北韓的動向所招致的安全顧慮，中共也比蘇聯顯得更迫切。因此，北韓傾向蘇聯時中共所受到的軍事威脅，比北韓傾向中共時蘇聯所受到的軍事威脅，在程度上顯出更大且迫切。於是中共對北韓的行動以之感受，比對蘇聯更具威力。

隨著中蘇關係的正常化，兩國緩和對北韓的競爭關係的情況下，使中共擴大對朝鮮半島的行動空間。因此，中共調整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出現有利的環境。

但是，中蘇對北韓的競爭關係不可視爲無限制的，所以並不產生一邊的利益必另一邊損失的 Zero-Sum Game 關係。在朝鮮半島，這種趨勢和中蘇關係的改善隨著兩國利益概念的變化而更加具體化。

尤其，中蘇關係往後不僅是國與國間的關係，甚至連黨與黨的關係都全面正常化的情況下，兩國對北韓的政策會擺脫過去互相競爭的政策，往相互共同步調的方向達成政策轉換的可能性增大。同時基本上追求維持現狀政策，而中蘇關係在這種狀況下發展下去則會更愈明確的。

特別是北韓金日成集團繼續固守維持史達林體制的情況，北韓體制與全面「超脫意識形態化」的中蘇改革體制形成對立，而這種事態的發展，使北韓與中蘇兩國間的關係緊張。中蘇兩國決不願與北韓體制上有如此緊張關係而導致相互關係的惡化，所以會對北韓採取共同步調促成其體制的「超脫意識形態化」的可能性較大。

然而，中蘇對北韓的競爭關係由 Zero-Sum Game 的關係轉換成 Non Zero-Sum Game 關係，這種趨勢直接投影在中蘇兩國對南韓關係發展的相互關係上。因爲中蘇對北韓的競爭關係與其深度，構成兩國對南韓的行動空間或與關係改善政策成爲相互緊密的函數關係。因此，中蘇兩國對與南韓的關係發展所具有的制約因素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是可以隨著他們在朝鮮半島利益概念的變化而改變的。中蘇兩國對南韓的關係發展，

就是所謂中國與南韓、蘇聯與南韓的關係的兩者相互作用，也隨著中蘇間緩和對北競爭關係，而由相互對立關係發展為互補或 Non Zero-Sum Game 的關係。

當然，中蘇兩國緩和對北韓的競爭關係是與根本消泯是不同的，而且中蘇兩國對北韓的同盟國，有支援同盟國的義務，所以中蘇緩和對北韓的競爭關係立即機械性影響在兩國對南韓的關係發展，無法發揮肯定的作用。可是，儘管也有這樣的制約性，中蘇兩國對南韓關係發展不可避免的，直接受到來自兩國對北韓競爭關係所產生的 Zero-Sum Game 關係變化的影響。

這在最近韓國與中蘇兩國的關係發展正具體地實際的。亦即，韓中共關係的發結為北韓對蘇的緊密，不僅不會出現帶給韓蘇關係發展直接負面效果的現象，反而關係的發展出現有利於韓蘇關係發展的環境或促進因素，又這樣的事實也同樣發生在韓中關係的發展。亦即，韓蘇關係的發展在中共為了展開與韓國發展關係的積極性、主動性的政策上，發揮極有利的作用。

過去數年間的韓中關係在量或質上有極大的發展。去年兩國的交易量逼近三十一億元，相互交流也由間接轉換為直接；又為了這種直接交流的制度設備，在兩國努力之下，形成正具體¹²。

儘管韓中關係如此急速的發展，韓蘇關係也正積極的發展。基於這些事實，可知韓中關係發展與韓蘇關係發展等相互關係早已出現 Non Zero-Sum 的關係。就是最近韓蘇關係發展也與韓中關係同樣都有極大的發展。兩國貿易量增加得相當大，當然積極造成了為兩國人民間的交流與直接交流的努力，尤其韓國與跟蘇聯有特殊關係的匈牙利等東歐諸國的關係正急速進展。特別是匈牙利的情況，已經和韓國建立外交關係。雖然東歐諸國的對韓積極政策可看做是由蘇聯允許東歐有自主權後所出現的現象¹³，但是從東歐與蘇聯間特殊的關係本質來觀察時，東歐諸國對韓政策的變化可看做是蘇聯的默許乃至與蘇聯協議的產物。因此，東歐諸國對韓的積極政策可看做是蘇聯對韓政策變化的迂迴表現。也因此，東歐對韓政策的變化可看做是蘇聯這種對朝鮮半島政策的重大變化受到中共對韓政策變化的相當大影響。

12：韓國產業研究院（KIET）特殊地域室，「韓中經濟交流增進方案」，1988年11月，P.P21-22 參照。

13：“GOSR 70th Anniversary：Gorbachev Address 4 Nov. Meeting” FBI Daily Report：Soviet Union，FBIS-Sov-87-213，4Nov，1987，PP22-24。“‘Soviet Yugoslav Declaration’ From Gorbachev SFRY Tour” F-BIS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FBIS-Sov-88-054，21 March 1988，PP. 34-38。

以上，南韓與中共關係的發展以及南韓與蘇聯關係的發展等相互關係，隨著中蘇關係的發展而由過去對立矛盾的關係轉變成相互作用或相互「相乘」作用的關係。這可看做是中共調整朝鮮半島新政策上，產生極為有利的環境要素的。

二、韓中共關係：其發展與展望

1. 中共現代化下的韓國位置與韓中共經濟關係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期三中全會」以後，掌權的改革勢力在經濟發展方面，擺脫了導致過去重大起伏與不安的現有急進主義的發展戰略，轉換成更長期性的持久戰戰略。亦即，中共的改革勢力一面塑造中共經濟基礎的脆弱性，一面又將經濟發展的目標與速度往適應於中共現實的方向去做全面調整。

尤其在釐訂經濟發展戰略上，全面擺脫毛澤東「戰爭不可避論」的戰略與機緣論的平均主義，確立認定地域間發展上有合理差等性的「點→線（面）→帶」發展理論，以此做為新的發展戰略。

現今提出做為中共經濟發展基本方向的「東靠西移」、「外引內聯」、「北進南」、「三線建設」等發展戰略的最終目的，一面解除沿岸地區與內地、都市與農村、東部與西部間所發生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一面完成中共全體經濟的均衡發展。但在達成這最終目標的過程中，認定其重要的方法是容許在地域間的發展上形成階層的合理差異性。亦即，在達成根本解決地域間不均衡、追求國家均衡發展的最終目標的過程中，有一個前提是認識到這種不均衡更形深化的過渡期現象是既不可避免又是必要的。

於是，中共在新的經濟發展戰略上，給予東部沿岸地區為開發的優先順位，塑造成國家資源分配最集中的地域。

然而，這種根本性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擺脫現有的閉鎖型自力更生政策，出現了形成與國際市場緊密相連的積極性對外開放政策，而這立即直接影響到塑造韓國在中共經濟發展所佔有的位置。

中共的對外開放基本上是以全球為對象¹⁴，但卻可從中共極欲追求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發展與中共現代化相結合等，找出其基本方向與這有關聯的，最近中共對亞太地區，尤其北從日本的太平洋工業帶，經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南到紐西蘭和澳洲等聯貫的高度經濟發展地區的關心大為增加。可是，自五〇～六〇年代所形成的這些西太平洋地區的高度經濟成長，看起來呈現出不與中國大陸毗連的「離岸」狀態分布。

14：「趙紫陽同世界經濟討論會發表電視演說」，「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2月4日。

中共與「離岸」狀態的西太平洋經濟發展長期性的「接岸」、「上岸」，一面展望連成大陸的經濟發展，一面使西太平洋經濟發展帶的「接岸」、「上岸」趨勢總括成三項。

一、由「離岸」狀態的西太平洋經濟發展帶的向西移動（西移），在以上海爲中樞、大連與廣州各爲南北兩端的中共沿岸開放地域上，形成高度經濟成長帶。二、由「接岸」狀態的亞太經濟發展帶向西北移動，形成以香港、臺北、上海爲南端，蘇聯的東方港（Vostochnyy）爲北端，並且以韓國釜山爲中心點的新經濟高度發展地帶。三、在西伯利亞、遠東建立獨立性國民經濟體制做爲主要目的的蘇聯遠東太平洋經濟戰略關聯。延長現今西太平洋經濟發展帶到北方的情況，可以形成蘇聯的東方港與中國大陸各爲東西兩端，東京與釜山爲中樞的新經濟高度發展帶的¹⁵。

以上三種「接岸」、「上岸」趨勢強調韓國在任一趨勢也是居於最重要的中心部位置。同時，強調韓國若堅持對有十億人口的潛在市場且即將轉化成實際市場的中共採取敵對立場，則經濟將轉爲落後；當然相反地給香港或新加坡帶來利益，以此強力暗示堅持與韓國積極性經濟協力關係¹⁶。這可以做爲最具體反映中共在毛死後所出現的對韓認識變化的重要資料。

然而，最近中共對亞太地區合作體系頗爲關心的基本原因，可以從他們在最近結合亞太地區所發生的經濟發展成果與其趨勢以及它的現代化政策看出端倪。因此，最近中共對韓國認識的變化可以看做不祇是韓國的經濟發展構成亞太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而且決不可低估韓國在亞太經濟發展成果與中國來往的重要關係。

尤其中共對亞太地區高度經濟發展的關心，當然可看做是與推進構成前述中共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基礎—「北進南下」政策相關聯的。爾後，中共增大對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關心，同時繼續推進使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沿岸經濟發展相互結合在這情況下，更可塑造韓國做中樞、橋樑性位置的重要性角色，並且可以斷定將更增大中共與韓國的經濟連繫。

往後，中共有一相當時間的經濟發展將隨著優先集中、分配資源發展沿岸地區的「沿岸經濟的優先發展政策」，帶有「東進化」的趨勢。而且中共這種經濟發展的東進化趨勢更加擴大與韓國經濟連繫的必要性。

首先，在最近中共所強調的沿岸經濟發展戰略裏，與韓國的經濟交流已經占了重要的比重。尤其該戰略所強調的技術移轉問題有關聯。韓國由於隨著圍繞在工資上漲與所

15：黃大明等七人，同註4，P.16。

16：ibid

得分配的勞資間對峙、持續性的產業結構高度化等，當然將轉移一部份勞力密集的設備，轉移到離韓國不遠的勞力密集產業輸入國。韓國這種調整產業結構的趨勢明確是中共在沿岸經濟發展戰略過程形成過程中不可忽視的。

尤其中共與韓國的經濟交流在其沿岸經濟發展戰略上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這是因為韓中經濟交流的發展構成該戰略的重要內容，並且可以活用做為刺激、促進日本和臺灣進出大陸的有效性方策（card）。

爾後如果中共的沿岸經濟開發戰略更具體化又更進展的話，中共與韓國形成經濟的紐帶也愈加結實，而且這與韓國要求與中共經濟交流是極相符合的。在現今西方先進國家因加強新貿易保護主義，追求持續性開放型開發戰略下，韓國正碰到一個迫切的問題。尤其以現有的分業結構做為前提，經由海外部門創造需要愈堅持其持續性高度成長的基本傾向則愈形困窘。因此，有必要使現有對美日一邊倒、偏向性貿易結構多元化，所以在這種貿易結構多元化的過程，中共便被塑造成一新伙伴（partner）。

以上，為韓國新貿易伙伴或為現實西海岸開發的大前提下，與中共發展經濟關係是不可避免的。這應與中共對於隨著中共經濟發展東進化趨勢所出現的與韓國經濟交流的切實性結合，形成韓中共互補關係的。

尤其從中共沿岸發展戰略來看時，往後的一段長期間內，內中共事實上會處於無法擺脫單純勞動密集產業結構的狀態。然而，美國或日本經濟賦與存在的條件反映其發展程度，具有高度資本與技術密集性的；相反的，中共經濟賦與存在的條件完全不同，單純勞動密集性強烈，所以美日對中共輸出製造廠（plant）不符合中共經濟賦與存在的條件，事實上很容易成為經濟性的頓挫。¹⁷

基於這種觀念，韓國企業的元素密集度更符合中共經濟賦與存在的條件。因此，看來除了尖端技術產業之外，韓國與日本企業競爭製造工廠的訂單方面，韓國具更有利的立場。這種事實說明可以在韓國與中共之間形成相當的互補關係。

同時，韓國對中共要求經濟交流也大為增加。首先，韓國努力增加為了推進國土的均衡發展與接納持續性工業部門的成長，而開發新工業區的必要性。於是相對在落後的東海岸地區推進積極性的經濟發展政策，突顯以此做為韓國新政府的重要課題。韓國西海岸地區由於長期和中國大陸斷絕關係，儘管也具備了經濟發展的有利自然條件，但相對地比起東南海岸地區則是落後的，但西海岸地區這種經濟的落後性不僅是引起人口流

17：日本當初對上海寶山鋼鐵廠計劃的失敗可以看出基本原因在於日本延遲確保資金、中國收容態勢的賦與存在條件，亦即資本密集度與技術密集度的差（Gap）。朴斗福，「中國沿岸開發戰略與韓中經濟關係增進方案」（IFANS出版，1988.），P.P 55-56 參照。

動嚴重的現象，當然也影響地域感情惡化等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地域感情的惡化、地間的對立或格差的深化，引發影響韓國政治發展的嚴重阻礙，而這是韓國新政府非解不可的最重要政治問題。

如上所言，韓國開發西海岸是爲了國家確實均衡發展、國內經濟的發展、開放國內等國內經濟的要求以及根本克服地域感情所必需的，這是我們韓國無法僅以主觀的條件或意志可以實現的，而是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果之大前提的。可是，韓國增強對開發西海岸的實際需要的話，則愈須與中共進行經濟交流，這將立即帶來與中共沿岸經濟開發戰略的自然結合。

2. 韓中共政治關係發展的限制與展望

儘管現今出現可以使韓國與中共之間發展相互關係的環境與因素，但由於「北朝鮮因素」或「中共統一原則」等重要的限制，以致在政治領域或「官方關係」的發展，很難在中短期內有所進展。

現在中共的對韓政策也比蘇聯更堅持慎重的態度。看來這種現象在往後不出現重大轉機的情形下，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其主要理由是因爲投射在中共對韓關係發展政策的北韓因素的作用，比蘇聯對韓政策更顯得強烈而敏感；而且由於中共國土分裂，其「統一意志」與「一個中國」的政策原則，直接與他們對韓關係的發展相連貫。

首先，從中共對外重視與每一國家的信義的態勢來看，中共不可能輕視與過去維持血盟關係的北韓之政治、外交關係。尤其儘管權力結構的更動，而要求與北韓維持現有友好關係的政治勢力卻存在於中共領導階層內，所以中共對韓政策的發展很難突破「北朝鮮因素」。尤其中蘇對北韓的競爭未根本消除的限度內，中共與蘇聯互相競爭對北韓的影響力，中共處於比蘇聯較不利的立場。亦即，中共對北韓的支援具有無法與蘇聯同等水準的經濟、軍事支援的限制，所以外交的支援成爲比任何更具有現實性的支援方式。如此一來，中共競爭對北韓的影響力祇好依賴外交支援方式。中共與韓國發展關係，無法擺脫「北朝鮮因素」，祇能堅持慎重的態度。

尤其中共與韓國的關係發展，能夠擺脫「北朝鮮因素」的歷史條件尚未成熟。亦即，儘管美蘇間緩和（*detente*）緊張關係，或中蘇關係急速進展等朝鮮半島周遭的狀況有重大變化；在南北韓間的對立構造沒有發生重大變化，而韓美間的軍事同盟關係等南方三角關係依舊維持一九五〇年代的冷戰體制，所以中共在朝鮮半島政策方面，無法造就可以修正或調整基本上維持與北韓政治、外交關係的對朝鮮半島政策原則的條件¹⁸。中共的這種看法在未達成南北韓對立的構造或南方三角關係的定質產生變化之前，中共

18：朝日新聞（東京），1988年2月17日。

韓關係的發展很難進展到政治、外交關係正常的水準。

況且，中共由於本身所設定的統一原則，如採納兩個韓國理論作為和韓國關係正常化的前提，亦即認定南韓為一政治實體，將會產生不利的政治後果。中共提出的解決中國分裂理論——「一國兩制」也決非指向聯邦制¹⁹。應該注意的，根據「一國兩制」合併中國，香港或臺灣並不是聯邦制的一成員，而是兩者僅具地方政府的性質。該理論中竭力抨擊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機構或聯合國，認為如此將變更中國的國家性質。

中共強調他們的「一國兩制」是可以在中國以外其他分裂國家，解決分裂的普遍性原則；而且支持北韓對朝鮮半島統一問題的立場，也正是根據這樣的「一國兩制」。因此，基於這種統一理論——「一國兩制」論積極抨擊兩個中國，中共很難接納朝鮮半島兩個韓國，或在韓國成為政治實體的前提下完成關係正常化或採交叉承認方式。

最近臺灣的國民政府一方面擴大與中國大陸的交流領域，一方面較大幅度地修正「不承認政策」。並且慎重地列舉討論以跟中共有邦交的國家恢復或建立外交關係的方式，更行想擺脫在國際社會孤立化的「雙重承認論」或是「一個中國二個對等政府」論。可是，北京當局認為台北的這種新大陸政策或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是「兩個中國」的政策。所以看來在北京政府認為台灣的這種新的統一政策是「兩個中國」論的限度內，臺灣離開這種統一理論或推進這種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會產生對中共進行對韓政治關係發展的行動重大限制。

19：董立坤，「論香港特別區在對外關係中的法律地位」，「學術季刊」（上海），1988年第4期參照。